

中华文化“走出去”对企业海外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准自然实验

顾振华, 侯文平

(上海商学院 商务经济学院, 上海 200235)

[摘要]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既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评估其影响大小并挖掘影响机制具有现实意义。依托异质性企业理论,提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推动相关企业“走出去”的完整路径,并利用2012年至2022年国内文化类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设立后,基地内文化企业的海外收入显著提高;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对文化企业“走出去”的推动效应不仅在时间上有持续性,在空间上有溢出性,而且还在地区、产权和企业类型上存在异质性;税收减免优惠和人力资本投入发挥了影响机制的作用。研究为实现文化自信目标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关键词] 中华文化“走出去”;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税收减免优惠;人力资本投入;文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 F719;F7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14(2024)03-0100-12

一、引言

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鼓励优秀中华文化“走出去”,既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中的应有之义。早在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就已经提出了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重大项目的方针,近年来,随着文化自信的受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中华传统文化的培育和推广成了各地政府“十四五”期间的目标之一,一系列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政策不断涌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从异质性企业理论来看,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只会专注于国内市场,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才会拓展海外业务^[1]。相对早就行销全球的“中国制造”而言,国内文化企业无论是在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还是在生产效率上都有待提高。那么,在国内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之际,以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走出去”能否真正推动国内文化企业“走出去”?此推动效应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又是通过何种机制从宏观政策落实到微观企业之中的?上述问题值得深思。

与本文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有两组。一是政策对企业海外收入的影响。异质性企业理论认为生产效率是决定企业是否进入海外市场的关键,该理论是国际贸易研究中最重要理论之一^[2]。从该理论出发,如果能够找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动因,那么就可以影响企业是否进入海外市场的决策^[3]。对于国内企业而言,政策鼓励一直被认为是决定企业生产效率的因素^[4]。毛其淋和赵柯雨认为产业政策能够促进企业出口海外的概率和规模^[5]。王晶晶和陈启斐发现以“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代表的服务业开放政策增加了技术先进型企业的海外业务收入^[6]。二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影响。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把研究范围聚焦在国家或者产业层面。蒋园园等评估了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对各省相关产业

[收稿日期] 2023-10-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2JZD0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3YJAGJW00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地方志研究”专项课题(2023VFZ004)

[作者简介] 顾振华(1987—),男,江苏常州人,上海商学院商务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学;侯文平(1977—),女,山西临汾人,上海商学院商务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通信作者,邮箱:kateyanyan@163.com。

增加值的促进效应^[7]。张琼和聂平香梳理了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特点与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8]。刘斌等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促进文化产品“走出去”的重要政策,优秀的中华文化消费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到了欢迎^[9]。韦永贵和张艺川表示友好城市的建立是一种推动跨文化传播的积极政策,友好城市间的往来频率会随着政策的落地而上升^[10]。

上述文献都是本文的重要研究基础。从研究结论可以知道,政策驱动了不同领域内企业进行跨国经营,而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否对文化企业也存在类似的影响已经开始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是,尚有以下几个方面亟待完善:首先,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企业层面产生的影响尚缺乏数据的支持;其次,考虑到政策传导的时长以及产业集聚现象的发生,需要判断文化政策的效果是否存在特有的时空性质;最后,文化领域的宏观政策落实至微观企业的渠道仍需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在异质性企业理论上逻辑推演出一条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影响相关企业“走出去”的完整路径,并挖掘出税收减免优惠和人力资本投入两条影响路径,随后利用2012年至2022年文化类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多期双重差分法为主要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二、理论分析

(一) 政策推动文化企业“走出去”

按照异质性企业理论,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只能专注于国内市场,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才会进入海外市场。对于国内企业而言,来自各级政府的支持将会一定程度地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11],因此政策因素成了决定企业是否进入海外市场并获取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多年来,制造业的发展始终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中国制造2025”规划等一系列政策,不仅推动国内企业获得海外市场,还使得国内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攀升^[12]。与之对应,随着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力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也成了社会各界的共识^[13],特别是在“文化自信”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以来,一系列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相关政策不断落地,这些政策旨在提升国内文化企业的生产效率,让更多的优秀文化产品能够进入海外市场。

在诸多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举措中,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和建设最具有代表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就明确提出“加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①。先后有29个行政区或者功能区于2018年和2021年分两批被认定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这些基地从制度创新、平台建设和营商环境入手,为基地内文化企业提供直接的经营便利。在政策激励下,我国文化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一大批文化企业从无到有、由弱转强,生产效率得以显著提升,逐渐具备了国际竞争力^[14]。如图1所示,比较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内外文化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后发现,在第一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设立之前,基地内外不同文化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2018年政策颁布后,基地内企业的生产效率不仅开始显著提升,且与基地外企业拉开了差距,尽管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整体的生产效率有所下滑,但是在第二批基地设立后,基地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又开始回升至较高水平,且始终领先于基地外企业。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1:

假说1: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推动了国内文化企业拓展海外业务,增加了其海外收入。

(二)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影响机制

1. 税收减免优惠

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是估计企业生产效率的经典模型^[15],模型的形式如式(1)所示:

$$\ln Y_{it} = \beta_0 + \beta_1 \ln K_{it} + \beta_2 \ln L_{it} + w_{it} + u_{it} \quad (1)$$

^①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2023-05-01)[2021-03-13].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从式(1)可以看到,被解释变量是企业产出增加值对数形式 $\ln Y$,其由资本投入对数值 $\ln K$ 、劳动力投入对数值 $\ln L$ 和生产效率 w 所决定。换言之,企业的生产效率是一个包含资本和劳动力的反函数,如果寻找到能够影响企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因素,就可以发现改变企业生产效率的内在机制。纳税是每个企业经营管理中不可少的一环,企业的税负大小与收入、成本和现金流等指标密切相关,不仅是征税的多少,税种、税制和纳税结构都会对企业资本积累造成影响,因此税收减免优惠一直被视为一项有效的政策激励手段^[16]。

与之类似,在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建设中,降低基地内文化企业的税负是帮助企业提升效率,走向海外市场的重要举措。根据2021年商务部等17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支持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商服贸函[2021]519号)^①,基地内符合条件的先进型文化企业,一方面可以按照15%幅度直接减免所得税,另一方面还可以享受各类财税支持。

2. 人力资本投入

劳动力是另一个改变企业生产效率的要素,在互联网时代,相比于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的质量对于生产效率而言更为重要,赵宸宇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在影响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媒介的作用,其中中介效应占比总效应的比例接近40%^[17]。在《关于支持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中也明确表示,加强人才引进和培育体系的搭建是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具体举措上,以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地为例,该基地充分发挥区域内丰富的高校资源,走出一条“教育+产业”相互融合的特色人力资本培养模式,截至2023年底,该基地已经创建跨境直播人才培训基地10个,培养高水平教师及产业人才超过400人^②。

如图2所示,企业在税收方面的减免优惠直接为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增加了资本投入,而企业在人才引进和培育上获得的支持,则增加了劳动力投入,二者促进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最终推动基地内文化企业拓展海外业务。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2:

假说2: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通过提高税收减免优惠、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两条路径,促进了生产效率,最终帮助企业拓展海外业务。

(三) 文化政策影响的时空特性

与货物贸易的商品相比,文化产品中的文化属性削弱了物理距离在空间关联上起到的阻碍作用,使得文化差异较小的主体之间更易受到相互影响。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仅使得文化邻近主体间的分享、交流和交易比以往更为便利,而且也有利于双方在各环节上的互相模仿学习^[18]。同样的道理,两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名单中的行政区和功能区分布在全国各地,既有特大城市,也有中西部二、三线城市,这些城市都有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文化基础较好、文化传播力较强的基地,在所处区域产生一定的集聚或者溢出效应,推动整个区域内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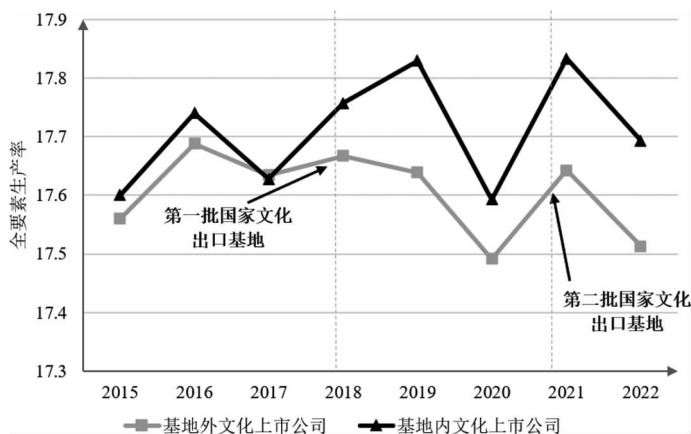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文化企业的生产效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CSMAR数据库制作

①商务部 中央宣传部等17部门关于支持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EB/OL]. (2023-05-01)[2021-10-25].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wgk/gkzcfb/202110/20211003211152.shtml>.

②李聪迎. 陕西自贸试验区高新功能区创新案例入选《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第三批创新实践案例》[EB/OL]. (2023-05-01)[2023-12-02]. http://www.cnr.cn/sxpd/shgl/sf/20231202/t20231202_526505763.shtml.

除了空间关联性外,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产生的文化政策影响在时间上也应该具备持续性。一方面,我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在高质量文化产品的设计和推广上,政府政策从推出、落实到最终政策效果的显现需要充分的时间保障;另一方面,文化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一种价值观,源远流长的优秀中华文化不断传承,逐渐形成了我国对外开放中独有的比较优势,随着文化自信程度的日益上升,这种比较优势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19]。因此,从时间上来看,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产生的政策影响会存在一定的持续性。为了检验上述分析中文化政策影响的时空特性,本文提出如下推论1:

推论1: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对文化企业海外收入的影响效应,在时间上有持续性,在空间上有溢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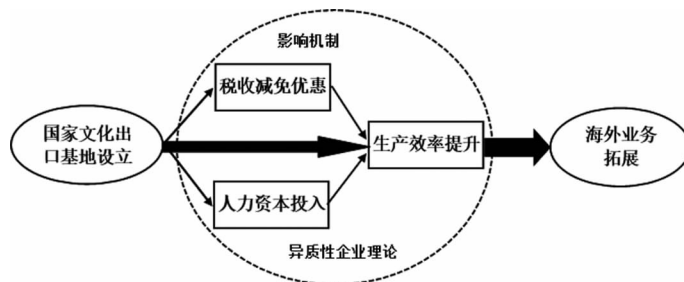


图2 文化企业“走出去”的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了实证检验假说1,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foreign_{it} = \beta_0 + \beta_1 policy_{it} + \sum \gamma_i control_{it} + firm_i + time_t + \mu_{it} \quad (2)$$

在模型(2)中, *foreign* 是被解释变量,反映文化企业的“走出去”现状。目前,成程等认为^[20],可以从四个维度去考察企业“走出去”现状:一是海外业务收入。二是海外并购的数量与金额。三是海外专利的申请与授权数。四是海外子公司的数量。对于国内文化企业而言,它们刚刚进军海外市场,海外子公司的数量非常稀少,而专利申请和授权的对象主要是制造业企业,因此本文选择从海外业务与海外并购两个维度构建国内文化企业的海外业务拓展指标。首先,在基准回归结果中,使用海外业务收入占资产总计之比 *foreign* 作为被解释变量,海外业务收入占比的增加意味着文化企业海外业务的拓展程度较高;随后,在稳健性检验中,参考毛新述和余德慧的研究^[21],使用海外并购标的金额占营业收入之比 *money* 作为另一个被解释变量,海外并购标的金额越高表示文化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意愿越强。

policy 是模型(2)中的解释变量,反映的是文化企业所在的办公地区是否入选了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参考祝树金等的做法^[22],将国家级基地或者园区的评选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若文化企业所在区域于2018年或者2021年进入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名单,则虚拟变量 *policy* 为1,否则为0。模型中 *control* 是由一组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包含了其他影响企业海外收入的因素。根据已有关于企业海外经营的文献^[23-24],本文选择以下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size* 是企业资产总计对数值,反映企业规模;*age* 是经营年份减去创立年份,体现了企业年龄;*internal* 是迪博内部控制指数除以100,表示公司治理水平;*hhi* 由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构成,反映股权结构;*debt* 是负债与资产总计之比,反映债务水平;*cash* 是货币资金与交易性金融资产之和与资产总计之比,反映企业现金流。另外,模型(2)中, *firm* 代表企业固定效应, *time* 代表年度固定效应, *u* 为随机干扰项,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与年份。

为了实证检验假说2,参考纪洋等的做法^[25],使用调节变量考察税收减免和人力资本投入在影响过程中发挥的机制作用,整个检验过程如模型(3)至模型(7)所示。参考韩宝山和李夏的研究^[26],使用文化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与营业收入之比 *tax* 反映企业实际税负,支付的税费越少则实际税负越低。参考赵彦锋和来培德的研究^[27],使用人均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对数值 *lnwage* 表示人力资本投入,支付的现金越多则表明人力资本的投入越高。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加入了 *policy* 和 *tax* 以及

$\ln wage$ 的交互项作为调节变量,以验证税收减免和人力资本投入产生的机制作用。参考王红建等的研究^[28],将营业收入、固定资产净值、员工人数和购买商品、资本投资分别作为产出、资本、劳动和投资的指标,利用 OP 法计算文化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_op 。

$$tax_{it} = \beta_0 + \beta_1 policy_{it} + \sum \gamma_i control_{it} + firm_{it} + time_{it} + \mu_{it} \quad (3)$$

$$\ln wage_{it} = \beta_0 + \beta_1 policy_{it} + \sum \gamma_i control_{it} + firm_{it} + time_{it} + \mu_{it} \quad (4)$$

$$tfp_op_{it} = \beta_0 + \beta_1 policy_{it} + \beta_2 tax_{it} + \beta_3 policy_{it} \times tax_{it} + \sum \gamma_i control_{it} + firm_{it} + time_{it} + \mu_{it} \quad (5)$$

$$tfp_op_{it} = \beta_0 + \beta_1 policy_{it} + \beta_2 \ln wage_{it} + \beta_3 policy_{it} \times \ln wage_{it} + \sum \gamma_i control_{it} + firm_{it} + time_{it} + \mu_{it} \quad (6)$$

$$foreign_{it} = \beta_0 + \beta_1 tfp_op_{it} + \sum \gamma_i control_{it} + firm_{it} + time_{it} + \mu_{it} \quad (7)$$

(二)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样本区间为 2012 年至 2022 年。选择该样本区间是因为两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分别于 2018 年和 2021 年对外公布。为了将两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均纳入样本区间,并将企业层面数据更新到最新时期,因此选择将样本的终点定位 2022 年。与之对应,为了使得在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设立前后能够充分分析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选择 2012 年为样本的起点。中国文化类上市公司被选择作为实证的对象,相比于其他产业,文化类上市公司无疑是受到该政策影响最早且影响程度最深的对象,对它们展开实证研究完全符合本文的研究主题。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有以下五个:一是国家各部门联合下发的两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名单;二是国泰安数据库(CSMAR),并通过万德(Wind)数据库和锐思(RESSET)数据库填补个别变量存在的缺漏值;三是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迪博内部控制指数;四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 EPS 数据平台,它们提供了城市发展的相关指标;五是 Davis 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数据库^[29]。

基于实证模型所用面板数据的一般处理规则^[23],本文进行以下操作:第一,按照企业的办公地址信息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名单中的基地名称进行匹配,坐落于入选基地中的企业被视为处理组,而未能入选的企业则为对照组;第二,将行业类别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2012 版)进行分类,仅保留文化类上市公司^①;第三,对主要变量使用最近邻线性插值来弥补缺漏值,对插值后仍存缺漏的观测值进行剔除^②;第四,剔除了 B 股以及被退市警告的观测值。

(三) 计量方法

依据 Hausman 检验的结果,主要的计量方法设定为在时间和个体上予以固定的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简称 TWFE)。由于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检验均拒绝了原假设,因此主要使用多期 Driscoll-Kraay 标准误。另外,为了缓解离群值的干扰,主要变量均在前后 1% 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从表 1 中被解释变量 $foreign$ 和 $money$ 的结果可以看到,文化类企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和海外并购金额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虽然国内不少文化类上市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已经占到了总资产的 4% 以上,但是大多数文化类上市公司尚没有拓展海外业务。相比之下,开展海外并购的文化类上市公司的数量则更少。从

^①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2012 版)的分类,文化类行业包括 C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和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②为了使得结果更为稳健,除了最近邻插值法,本文还使用以下三种常用方法对样本进行处理:一是剔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二是使用滞后一期弥补缺失值,三是内插和外推补充缺失值。结果依然稳健。

解释变量 *policy* 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可以看到,入选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名单的观测值占总样本的 13.4%。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 分位数	中位数	75 分位数	最大值
<i>foreign</i>	647	0.048	0.130	0	0	0	0.018	0.970
<i>money</i>	647	0.024	0.147	0	0	0	0	1.785
<i>policy</i>	647	0.134	0.341	0	0	0	0	1
<i>size</i>	647	22.082	1.010	19.857	21.378	22.058	22.932	24.114
<i>age</i>	647	18.091	6.677	6	13	17	23	34
<i>debt</i>	647	0.336	0.179	0.053	0.216	0.325	0.412	0.920
<i>cash</i>	647	0.266	0.160	0.008	0.140	0.236	0.378	0.826
<i>hhi</i>	647	0.604	0.151	0.204	0.491	0.615	0.719	0.885
<i>internal</i>	647	0.633	0.143	0	0.617	0.667	0.706	0.815
<i>tax</i>	647	0.057	0.059	0.001	0.024	0.043	0.076	1.147
<i>lnwage</i>	647	11.891	0.546	10.653	11.517	11.887	12.242	13.644
<i>tfp_op</i>	647	17.598	0.880	13.733	17.005	17.546	18.251	19.706

从税收减免优惠指标 *tax* 以及人力资本投入指标 *lnwage*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文化类上市公司支付的各项税费占营业收入之比平均值为 0.057,这表明文化类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在 5.7% 左右。人力资本投入指标 *wage* 的平均值为 11.891,中位数为 11.887,这表明文化类上市公司人均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超过 14 万元。从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相较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大型企业,文化类上市公司普遍都较为年轻且资产规模较小,这符合文化类企业轻资产的特点。通过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结果可知,实证样本基本克服了离群值干扰。

(二)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列(1)至列(4)报告了模型(2)的基准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伴随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基地内文化类上市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显著提高,从影响大小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当文化类上市公司所在区域入选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名单之后,其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将会提高约 2.31 个百分点。这样的结果验证了假说 1 中的观点。列(5)报告了加入解释变量动态效应虚拟变量 *policy_{it}* 后的结果,该变量在国家文化出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i>foreign</i>				
<i>policy</i>	0.0140 *** (2.845)	0.0248 *** (2.847)	0.0245 *** (2.793)	0.0231 *** (3.042)	
<i>policy0</i>					0.0201 *** (3.304)
<i>policy1</i>					0.0231 ** (2.422)
<i>policy2</i>					0.0227 *** (3.130)
<i>policy3</i>					0.0260 *** (3.196)
<i>policy4</i>					0.0360 *** (3.914)
<i>size</i>			0.0008 (0.139)	0.0009 (0.140)	0.0006 (0.089)
<i>age</i>			0.0028 (1.610)	0.0038 ** (2.141)	0.0043 ** (2.293)
<i>hhi</i>			0.1191 ** (2.275)	0.0971 ** (1.988)	0.0951 * (1.927)
<i>internal</i>				0.0005 (0.023)	0.0012 (0.053)
<i>debt</i>				-0.0051 (-0.797)	-0.0061 (-0.922)
<i>cash</i>				0.0651 *** (3.128)	0.0637 *** (2.999)
常数项	0.0458 *** (14.053)	0.0844 *** (27.171)	-0.0520 (-0.305)	-0.0722 (-0.405)	-0.0700 (-0.390)
年度虚拟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47	647	647	647	647
R ² _w	0.0056	0.075	0.0894	0.109	0.110

注:***、**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字为双尾检验的t值。下同。

口基地设立后的 k 年会赋值为 1, 否则为 0。从结果可以看到, 设立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除了在当期会造成显著的影响外, 政策出台后的许多年内, 基地中企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仍旧会受到积极的影响, 因此推论 1 获得了验证。

正如理论分析的那样, 根据异质性企业理论, 只有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才会“走出去”。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到, 即便是文化类上市公司, 它们的资产规模和企业年龄与国外的主要文化类大型企业也存在明显的差距。与此同时, 相比于国内制造业受政府的重视程度, 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 随着文化自信、中华文化“走出去”等一系列方针的提出, 文化类企业逐渐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典型代表, 在国家各部门的配合下, 各基地均在税收减免优惠或者人力资本投入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越来越多的国内文化企业依靠政策的支持, 提高了生产效率, 开始走向国门。

(三)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 TWFE 进行多期双重差分法的模型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参考 Beck 等的方法^[30], 本文设定如下实证模型检验平行趋势:

$$foreign_{it} = \beta_0 + \sum_{k \geq -5} \beta_k year_{2018+k} + X_{\gamma} + firm_i + time_t + \mu_{it} \quad (8)$$

模型中, $year$ 是一个年度虚拟变量, 当文化类上市公司所在区域于 2018 年或者 2021 年成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那么该变量在前后 k 期会赋值为 1, 否则为 0。为了保持一个足够时间的观察窗口期, k 的取值为 $[-5, 4]$ 。从图 3 的结果可知, 处理组和对照组中文化类上市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 在政策发生之前, 无法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差异。但是当政策发生后, 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海外业务收入上开始出现显著差异。该结果一方面表明本文所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了推论 1 中的观点,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影响效应在时间上具有一定持续性, 企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二年产生显著变化。

2. 安慰剂检验: 随机抽取处理组

La Ferrara 等通过对样本区间内的观测值进行随机抽取, 模拟出一组用于进行安慰剂检验的伪处理组^[31]。本文参考 La Ferrara 等的做法^[31], 如果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确实能推动文化企业拓展自身的海外业务, 那么这种随机模拟的伪处理组结果无法保持显著。为了降低小概率事件的产生, 本文将整个随机过程重复 300 次。图 4 纵轴是估计系数的概率密度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到, 安慰剂检验的系数估计平均值在 0 值附近, 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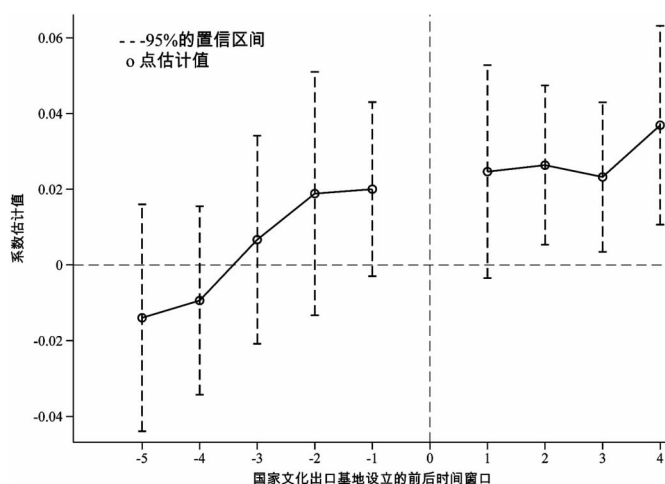


图 3 平行趋势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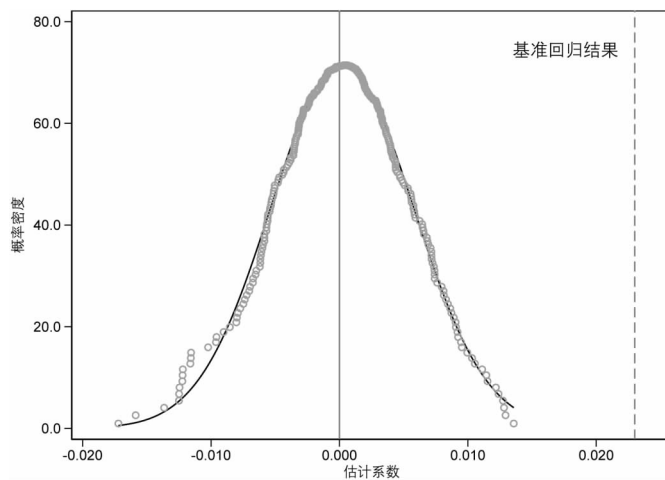


图 4 随机抽取结果

模型(2)中的基准回归结果为0.0231,属于异常值,并且在1%的水平上保持显著。基于此,本文所使用的多期双重差分法通过了随机抽取的安慰剂检验。

3. 测量误差

考虑到本文的数据来源均是公认的权威机构,因此测量误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变量构造不合理和计量方法选择上的不合理。对于前者,使用海外并购标的金额与营业收入之比 *money* 作为另一个被解释变量;对于后者,参考 Braghieri 等的研究^[32],使用高维泊松极大似然估计法、两阶段双重差分法以及交互加权方法三种异质性稳健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33-35]。从表3列(1)结果可以看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对于文化企业海外并购同样也有积极作用,从列(2)至列(4)的结果可以看到,无论采取哪一种异质性稳健双重差分法,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仍然可以推动文化企业拓展海外业务。

表3 测量误差与遗漏变量

	(1)	(2)	(3)	(4)	(5)	(6)
	DK	高维泊松	两阶段	交互加权	DK	PSM
	<i>money</i>		<i>foreign</i>			<i>foreign</i>
<i>policy</i>	0.0099* (1.690)	0.8717*** (3.805)	0.0092* (1.910)	0.2246*** (3.033)	0.0225*** (2.903)	0.0150** (2.057)
<i>lngdp</i>					0.0200** (2.353)	
<i>rate3</i>					2.3874*** (4.054)	
<i>uncertain</i>					-0.2940*** (-4.480)	
常数项	-0.6020*** (-3.607)	-2.7221 (-0.785)	-	-0.0029 (-1.429)	-0.1218 (-1.614)	0.2565 (1.079)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47	346	647	645	584	448
R ² /R ² _w /R ² _p	0.0375	0.322	—	0.112	0.119	0.0882

4. 缓解遗漏变量

为了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影响,基于相关研究^[6],本文加入城市的GDP对数值 *lngdp*、城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rate3* 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 *uncertain*。与此同时,参考 Heckman 等的方法^[36],使用了1:3比例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PSM)构建处理组,让实证模型更符合准自然实验的条件。从表3的列(5)和列(6)可以看到,无论是加入更多控制变量,还是经过倾向得分匹配之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影响效应始终保持显著。这样的结果从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的角度,再次验证了假说1中的观点。

五、进一步分析

(一) 空间溢出效应

尽管本文认为2018年和2021年国家各部门联合公布的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名单符合准自然实验条件,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不仅会获得政策上的支持,同时也被要求加快形成产业和地区的集聚效应,加上文化产业所具有的高流动性特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对周边企业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如果忽视这种空间溢出性,会导致系数的估计偏差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在推论1中,本文指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对于文化企业海外业务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时空特性。为了对推论进行检验,根据AIC和BIC值的大小,使用如下形式的空间自相关模型(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简称SAC模型)进行检验:

$$y_{it} = \beta_0 + \rho \sum w_{ij} y_{jt} + \beta_1 policy_{it} + \sum \gamma_i control_{it} + city_i + time_t + u_{it} \quad (9)$$

$$u_{it} = \lambda \sum w_{ij} u_{jt} + \varepsilon_{it} \quad (10)$$

在模型(9)和模型(10)中, y 表示被解释变量,使用该城市中文化类上市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总量加1后的对数值 $\ln foreign$ 作为代理变量。 W 则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w_{ij} 是 W 中的元素,此时,下标 i 和 j 分别表示不同的城市。 $control$ 由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组成,和上文中选择的城市层面变量保持一致。为了满足空间计量模型的条件,将原有企业层面的数据归结至城市层面,经过插值和剔除缺漏观测值后,形成一个 2012 年至 2022 年的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参考吴良平等的做法^[37],使用城市间的逆距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city$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 $time$ 表示年度固定效应, u 和 ε 均为随机干扰项,下标 i 表示城市。

从表 4 的结果可以发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对于基地内文化企业拓展海外业务,始终具有直接影响。从 λ 的系数估计值结果可知,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还会对周边城市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显著性相比于直接影响有所下降。从最后三行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总影响大小上来看,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造成的直接影响非常显著,间接影响虽然也为正,但是显著性下滑,总的影响在直接影响基础上扩大了超 40%。该结果验证了推论 1 中的部分观点,中华文化“走出去”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性。

(二) 机制分析

表 5 报告了模型(3)至模型(7)的实证结果,从列(1)和列(2)的结果可以看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降低了文化企业的实际税负,提高了文化企业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从列(3)和列(4)的结果可以看到,税负与政策变量的交互项为负,这说明实际税负的降低将会有助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影响,而人力资本投入与政策变量的交互项为正,这说明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有助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面影响。不过,相比较而言,税收减免在整个影响过程中发挥的机制作用更为显著。另外,如表 5 列(5)的结果所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确实推动了它们海外业务收入的增加,这与异质性企业理论是一致的。通过加入调节变量的做法,假说 2 中有关影响机制的观点仍然获得了实证结果的支持。

表 4 空间溢出性

	(1)	(2)	(3)
	<i>lnforeign</i>		
<i>policy</i>	3.7528 *** (4.895)	2.6794 *** (2.725)	2.6791 *** (2.713)
λ	0.6964 *** (10.823)	0.3548 ** (2.487)	0.3541 ** (2.404)
ρ	-1.2344 *** (-8.192)	-1.0559 *** (-5.369)	-1.0553 *** (-5.265)
城市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度虚拟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62	462	462
R ² _p	0.125	0.115	0.0896
直接影响	3.9577 ***	2.7024 ***	2.7020 ***
间接影响	6.0550 ***	1.0916	1.0883
总影响	10.0128 ***	3.7939 ***	3.7903 ***

表 5 机制分析

	(1)	(2)	(3)	(4)	(5)
	<i>tax</i>	<i>lnwage</i>	<i>tfp_op</i>	<i>foreign</i>	
<i>policy</i>	-0.0066 ** (-2.575)	0.0330 ** (2.538)	0.0807 * (1.844)	-1.1202 * (-1.817)	
<i>tax</i>			-0.5339 ** (-2.159)		
<i>policy</i> × <i>tax</i>			-3.4668 *** (-2.708)		
<i>lnwage</i>				-0.0818 (-0.826)	
<i>policy</i> × <i>lnwage</i>				0.0862 * (1.672)	
<i>tfp_op</i>					0.0125 *** (2.688) -0.0549
常数项	-0.0871 (-0.679)	14.0268 *** (12.214)	2.4746 ** (2.181)	3.5681 *** (6.744)	(-0.461)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47	647	647	647	647
R ² _w	0.0813	0.540	0.441	0.433	0.104

(三) 异质性分析

表6 报告了异质性分析的结果。从表中列(1)和列(2)的结果发现,相较于中西部地区的文化类上市公司,东部城市中的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对于文化企业海外收入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从表中的列(3)和列(4)结果可以知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都会对它们“走出去”产生积极的影响,不过相较于国有性质的文化类上市公司,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下,中华文化“走出去”对海外收入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从列(5)和列(6)可以发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对文化类制造业的影响要比文化类服务业的影响更为显著。

上述图表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本文的假说1、假说2 和推论1 中的观点,即以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将推动文化类上市公司拓展海外业务,此影响效应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持续性,在空间上具有溢出性,税收减免优惠和人力资本投入在整个影响过程中发挥了影响机制的作用。另外,本文还利用安慰剂检验、异质性稳健双重差分法等手段验证了实证模型使用的合理性,并且降低了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总体来看,本文的实证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表6 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东部	中西部	国企	非国企	文化制造	文化服务
	<i>foreign</i>					
<i>policy</i>	0.0287*** (2.957)	-0.0017 (-1.213)	0.0006 (0.851)	0.0517*** (2.850)	0.1373** (2.780)	0.0047 (1.134)
常数项	0.0557 (0.270)	-0.3993*** (-4.004)	-0.0693** (-2.547)	1.1621** (2.140)	0.847 (1.574)	-0.0244 (-0.190)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76	171	277	370	150	497
R ² _w	0.137	0.298	0.344	0.180	0.311	0.0577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提出了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影响文化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完整路径,并利用2012年至2022年在中国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文化类上市公司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当文化类企业所在区域成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之后,企业的海外收入将会显著提高。从影响大小上来看,伴随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设立,基地内文化类上市公司的海外收入将提高2.31个百分点。第二,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对文化企业海外收入的影响效应,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空间上具有溢出性。从时间上来看,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发布后的第二年开始帮助企业提升海外收入;从空间上来看,该积极效应不仅对基地内企业有效,还可以溢出至周边区域,总溢出效应的大小比直接效应提高了近40%。第三,在影响机制上,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将会给予基地内先进的文化企业税收减免优惠并增加企业的人力资本投入,这些积极变化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提升,最终帮助它们拓展海外业务,增加海外收入。第四,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产生的海外收入影响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产权和不同文化类型企业中存在异质性,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城市以及文化制造业的样本中更显著。

上述结论对政府实现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相对于制造业和其他行业而言,国内文化类企业在海外业务的拓展上既缺乏硬件条件,也缺乏经验教训。本文的结论支持了以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积极影响。那么,在现有两批29家基地的基础上,应该扩大基地覆盖的范围,推动更多优质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其次,税收减免优惠和人

力资本投入是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推动文化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影响机制,还为后续更多中华文化“走出去”政策的落地和实施指明了方向。在政策具体的行动方案及评价体系之中,可以将税收的优惠力度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作为两个建设和考评的重点,旨在让宏观政策能够更快更好地服务于企业。最后,文化类上市公司是国内文化产业的缩影,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文化类上市公司。不过,除了上市公司,中小型的文化类企业才是整个产业的中坚,它们能否在海外市场获得一席之地,才是未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想要全方位考察各类文化激励政策的效果,就应该收集和开发更为微观的文化个体数据,进一步增加实证检验结果的可信度。

参考文献:

- [1]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 71(6): 1695 - 1725.
- [2] 李磊,蒋殿春,王小霞. 企业异质性与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J]. *世界经济*, 2017(11): 47 - 72.
- [3] Burstein A, Melitz M J.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 dynamics[R]. NBER, 2011, No. 16960.
- [4] 蒋冠宏.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J]. *经济学动态*, 2022(10): 101 - 120.
- [5] 毛其淋,赵柯雨. 重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J]. *财贸经济*, 2021(11): 131 - 145.
- [6] 王晶晶,陈启斐. 服务业开放与企业跨国经营:来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22(9): 124 - 141.
- [7] 蒋园园,杨秀云,李敏.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效果及其区域异质性[J]. *管理学报*, 2019(5): 9 - 19.
- [8] 张琼,聂平香. 提升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发展水平的思考[J]. *国际经济合作*, 2020(5): 118 - 126.
- [9] 刘斌,邹恬华,张涵. “一带一路”倡议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多期 DID 模型的经验分析[J]. *南方经济*, 2023(7): 135 - 152.
- [10] 韦永贵,张艺川. 跨国文化传播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友好城市的研究视角[J]. *南方经济*, 2021(11): 97 - 121.
- [11] 蒋冠宏.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J]. *经济学动态*, 2022(10): 101 - 120.
- [12] 毛其淋,赵柯雨. 重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J]. *财贸经济*, 2021(11): 131 - 145.
- [13] 陈柏福,邓子璇,杨建清.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政策变迁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8(10): 39 - 51.
- [14] 辛向阳. 社会主义文明强国建设的意蕴与路径[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21 - 27.
- [15] 马亚明,苏显冰. 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探讨、实证分析和滨海新区实践——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7(4): 147 - 154.
- [16] 吴斌,舒竹语. 税收征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来自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 125 - 135.
- [17] 赵宸宇,王文春,李雪松.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财贸经济*, 2021(7): 114 - 129.
- [18] 郑义,周磊,戴永务. 文化产品出口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文化空间的视角[J]. *财贸研究*, 2017(11): 13 - 23.
- [19] 汪颖. 文化自信与文化产品贸易可持续发展[J]. *当代财经*, 2023(5): 106 - 118.
- [20] 成程,陈彦名,黄勃. 战略联盟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公告大数据文本分析的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22(6): 159 - 174.
- [21] 毛新述,余德慧. 会计准则趋同、海外并购与投资效率[J]. *财贸经济*, 2013(12): 68 - 76.
- [22] 祝树金,龚世豪,张于喆,等. 军民融合园区政策的绩效评估——基于国家军民结合产业基地的准自然实验[J]. *中国软科学*, 2021(9): 137 - 150.
- [23] 覃家琦,杨玉晨,王力军,等. 企业家控制权、创业资本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21(3): 132 - 149.
- [24] 史本叶,赵铮. 海外并购的融资模式与财富效应——基于 A 股上市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2): 139 - 148.
- [25] 纪洋,王旭,谭语嫣,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隐性担保与企业杠杆率分化[J]. *经济学(季刊)*, 2018, (2): 449 - 470.
- [26] 韩宝山,李夏. 税收减免提高企业创新活力了吗? ——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检验[J]. *经济学动态*, 2022(3): 88 - 107.
- [27] 赵彦锋,来培德. 国有股东能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吗? [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4(1): 44 - 55.
- [28] 王红建,王靖茹,吴鼎纹. 并购活跃度、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错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OL]. *南开管理评论*. 2023 - 01 - 12,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2.1288.f.20230109.1824.001.html>.

- [29] Davis S J, Liu D, Sheng X S.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 China since 1949: The view from mainland newspapers[R]. Working Paper, 2019.
- [30] Beck T, Levine R,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5): 1637-1667.
- [31] La Ferrara E, Chong A, Duryea S. Soap operas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2, 4(4): 1-31.
- [32] Braghieri L, Levy R, Makarin A. Social media and mental heal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2, 112(11): 3660-3693.
- [33] Head K, Mayer T. Misfits in the car industry: Off shore assembly decisions at the variety level[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19, 52: 90-105.
- [34] Gardner J. Two-stag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R/OL]. Working Paper, 2022.
- [35] Sun L Y, Abraham S. Estimating dynamic treatment effects in event studies with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1, 225(2): 175-199.
- [36] Heckman J J, Ichimura H, Todd J. 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 Evidence from evaluating a job training programm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7, 64(4): 605-654.
- [37] 吴良平,胡健敏,张健. 中国省域入境旅游发展的空间计量建模与影响因素效应研究[J]. 旅游学刊,2020(3):14-27.

[责任编辑:高 婷]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on Enterprises’ Overseas Revenue: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National Cultural Export Bases

GU Zhenhua, HOU Wenping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200235, 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export bases is not only a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but also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to build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al country, so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ssess its impact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Relying on the theory of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 we propose a complete path for national cultural export bases to promote related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and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by utilizing the data of domestic 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22.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export base, the overseas business income of the cultural enterprises in the base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export base on the overseas business of the cultural enterprises is not only sustaining in time, but also spatially overflowed, and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region, property rights and enterprise types; the tax relief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nd the investment of human capital play the role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realizing the goal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Key Words: the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national cultural export base; tax relief; human capital input; powerful cultural country